

(学会内部交流，非卖品)

# 胡适研究通讯

2010年第1期(总第9期)



胡适研究会编

2010年2月25日

# 目 录

《胡适作品新编》前言 .....	胡 明 (1)
唐德刚：一个充满中国情怀的华裔历史学家 .....	欧阳哲生 (4)
《胡适全集》失收的一封复日本学者的信 .....	石立善 (8)
胡适红学补遗 .....	刘广定 (14)
《胡适全集》日文记载举误 .....	石立善 (16)
《胡适全集》错谬举例 .....	宋广波辑录 (21)
胡适 What I Believe 及 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	
与《四十自述》关系考辨 .....	张 婷 (26)
胡适断案 .....	张书克 (31)
胡适日记中的“米桑”是谁? .....	张书克 (33)
胡适的佚文和佚信 .....	(34)
1、我对于北京第一个试验学校的希望 .....	(34)
2、七学术团体对美国退还赔款用途之主张 .....	(36)
2009年1月至6月胡适研究文章目录索引 .....	宋广波辑录 (37)
《胡适研究论丛》第二辑征稿启事 .....	(42)

# 《胡适作品新编》前言

胡 明

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角色独特、地位显赫因而影响深远的一位，从某种意义上——例如历史时段的切割、文化范式的转型——来说，中国文学发展演化正是由胡适开启了“现代”的大门，即是说研究界从一个普遍接纳的共识上认定，胡适策动的文学革命把中国文学从旧的变成新的，从“传统”的变成了“现代”的。不仅在形式内容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面貌上，包括语言形式、结构形态、精神内涵、审美理念和思维特质，均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或者说，完成了“现代性的激活”，因而整个（文化质性上）由“死”的变成了“活”的，由“鬼”的变成了“人”的。——这种“人”的文学，或者说“人话”文学真正体现了“人”为中心、“人”为根本的现代理念，它对人的内心世界的表现与发掘远远超过前辈，对人的理解与认识也远远高于前辈。“现代”的新文学是反映人自身的和社会现实的，同时又必然是为了人自身境遇的改善与社会现实的改良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现代”文学在孕育与设计时鲜明透亮的“现实”和“人”的内蕴，它的更深层次上的意识便是强调文学创作活动真实描画人生现状，积极参与现世生活，能动改造社会现实的时代责任——这正是胡适牌号的“现代”文学的基点，而这个基点无疑是现实主义的。——这场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文学革命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与悠久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是贯串在同一条逻辑链上的。

胡适作为“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革命的工作、文学的现代转型工作只是他整个文化转型、文明重建总目标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眼光关注在思想史、文化史的历史进化，他在新文学史的建构中的工作重心也正是把中国文学从古典的、传统的、内容偏于山林的、精神倾向贵族的转变为现代的、写实的，内容更贴近于社会的、精神转折向平民的。——胡适对文学的“兴趣”更多的凿实在对文学形态的改造和文学理念的刷新上。胡适经常说：历史是他的“本行”，哲学是他的“职业”，而文学则是他的“兴趣与爱好”。文学虽然是他“本行”之外的爱好，“职业”之余的兴趣，却又是他最早实施革命转型战略爆破的领域，用功最巨、智慧最集中、创造性思维最活泼，工作面掘进最深，因而历史影响最久远的领域。从“首举义旗”打响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的第一枪《文

学改良刍议》起，《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论短篇小说》、《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思潮的意义》到后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逼上梁山》、《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等，胡适凝结了最大的心力，为“现代“文学真正在中国的着床与孕育，认认真真地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这里我们须明白的一点是：正是在胡适一波接一波的成功垦殖、拓边、播种的开路引导之下，“文学革命”的“义旗”后面，一大批创作大军拥簇跟进，鼓荡而出。——我们今天在为“五四”这支新文学大军勾脸画彩、描摹风色、历数他们的旗号招牌、行头装束时，不可忘却“首举义旗”并抡着板斧一路拼命杀奔向前的“急先锋”胡适。——胡适曾说过：“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为中国“现代”文学开风气的历史功绩应是放在第一位的。

我们再来看胡适自己的文学作品。

胡适常常自叹：“提倡有心，创造无力”。这个“无力”最典型地反映在他的小说创造方面。我们读读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关于小说“写什么”、“怎么写”的精辟论述；读读他的《论短篇小说》中关于短篇小说审美理论的界说、关于“横截面”和所谓“最经济的手段”的艺术分析，我们实在无法理解这么一个能做出现代小说精美教程、又翻译出版了这么多仪态优美西方小说的胡适，竟没能交出现代小说的合格作业来。胡适几乎没有写过小说，他曾有过少得可怜的几次小说创作冲动（或者说尝试），留下了二三篇从形式结构到形象思维颇象小说的作品：《一个问题》只是他的人生哲学与伤逝情绪的图解；《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也是借杜撰的“唐僧割肉度群魔”来隐喻自己的淑世哲学与愤激心理；他的遗稿中还留有一篇描述他的人力车夫的经济生计的纪实小说的残稿。只有《差不多先生传》差强人意，寓意深远，手段经济，但作为“小说”又显得太单薄，只能算作文化小品。

再说戏剧。同样，胡适对于戏剧艺术的现代改良发表过不少书面意见，也有过很精致的、具体可行的审美主张，他曾用心深刻地介绍过从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腊戏剧到莎士比亚、莫里哀到最近六十年来欧洲的散文戏本的结构、体裁及种种艺术审美的胜人之处，介绍过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问题剧、象征剧、心理剧、讽刺剧，介绍过易卜生、萧伯纳、高尔斯华绥、斯特林堡、百里欧、霍普特曼、梅特林克等一堆卓有成就，影响深巨，酿造成“欧美文艺最强有力”戏剧风潮的西洋戏剧大家。他这么灵犀相通、精绝到位地宣传易卜生，这么眼光尖锐地看出曹禺《雷雨》在“文化习性”上的败笔，却不肯当戏剧家，亲自写戏本。但胡适写过一出轻喜风格的独

幕剧《终身大事》，他称之为“游戏的喜剧”。胡适这部唯一的创作剧本本意并不在戏剧改革（只是伦理革命示范的教具或者说辅助课件），意外地竟成了中国现代话剧的开山之作，具备了特别的历史经典地位——形式上开启了一个时代，使后来的研究中国现代戏剧史的学者均无法绕过它去。

胡适的这册作品新编主要的两个门类是散文与诗歌。

胡适的散文作品，当然与他的白话文运动的理论提倡与实践示范联系在一起。这里我们并不打算更多地收入他的关于新文学的理论文字，因为其中许多名篇读者耳熟能详。考虑到散文的文学质性，我们更有兴趣也更多的是选择胡适的文艺短章随笔，其次是社会人生杂感，再次是思想文化论辩，最后是序跋、书信与日记。——序跋，注重他的重要的为文化学术著述作的序跋；书信，注重的是有旨意、有情绪、有人文趣味、有历史价值的书信；日记，从文体的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算是“作品”，原本也是无意昭世与传世的。我们这里只选录了嵌入文化理性深处、从特别的视角展示了大师一生生命逻辑进程的那几段。总之，选文篇目大抵都符合胡适在《什么是文学》中说的“三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有这“三要件”，文章即有了生气，有了生命，也有了传世的价值。

诗歌，我们这里选了二十五首。胡适是公认的“新诗老祖宗”，他的文学革命最早即是在新诗的尝试上实施战略爆破的。胡适一开始就把白话能不能写诗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对抗最尖锐而具义最沉重的前哨站，我们从梁启超忽而支持称美，忽而改口否定、章士钊忽而举手“投降”，忽而“反叛”出去的反复中就可以看出白话新诗破土而出时艰难困窘的命运。——当然，胡适的“尝试”最后是大获成功的。他 1917 年发表的《白话诗八首》和《白话词四首》是中国现代第一批白话诗词；他 1918 年发表的《老洛伯》是中国现代第一首白话译诗；他的《尝试集》1920 年 3 月的出版（9 月又出增订二版）又是中国白话新诗的第一本集子。这几个第一铸成了他在中国白话新诗领域“开风气”首创地位和实际上的宗师身份。1931 年 1 月 24 日胡适读了徐志摩、闻一多、陈梦家三人呈送他批评的诗歌后，大加叹赏，忍不住宣布新诗尝试进程的最终完成，画上完美圆熟的句号。他在日记中说：“新诗到此时可算是成立了。……他们此时的成绩已超过我十四年前的最大期望了。我辟此荒地，自己不能努力种植……这几年来，一班新诗人努力种植，遂成灿烂的园地。”——这大抵也正是胡适领导中国诗歌范式转型的文化意义之所在，他自己能不能种植并不重要。

胡适关于新诗的审美主张大抵也累同于文章的“三要件”，胡适自己

匡定的“胡适之体”诗歌也有“三要件”：一明白清楚，言近旨远；二有剪裁，有组织；三意境平实。他遵循的一条审美原则便是他反复强调的“诗的经验主义”。我们这里选的《梦与诗》似乎正是胡适用诗的语言作的“主义”的诠释。他在诗后特别附了一节跋语：“这是我的‘诗的经验主义’。简单一句话，做梦尚且要经验作底子，何况做诗？现在人的大毛病就在爱做没有经验作底子的诗。”——《尝试集》与《尝试后集》中胡适有意做放脚鞋样，刻意展示新诗蜕变过程，理性成分太重。我们这里的选诗注重诗人的心理情绪与思想波澜，更留意选诗的艺术结构、情调韵味与审美意趣。当然也选了一二近乎金刚怒目式的篇章。这些诗目大抵代表了胡适最好的诗。——二十年前，我编注《胡适诗存》时即注意到：胡适在新诗苗圃里手植的那些株示范的花草，或许也正是他那个时代最光华耀目的仙葩瑶草。

2009年5月4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唐德刚：一个充满中国情怀的华裔历史学家

### 欧阳哲生

10月29日上午，当我正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出席会议时，安徽大学历史系陆发春教授从合肥打来电话，告诉我唐德刚先生于26日晚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因肾衰竭去世，闻后心头一怔。下午我赶快拟一唁电传真给唐先生的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慰问。接着，媒体记者的电话纷至沓来，或采访，或约稿，请我谈谈对唐先生去世的感想。海外朋友亦通过电话或电邮传递消息，报告相关讯息。唐先生去世的消息迅速在网上、报上各种媒体传开。

大概在大学时代，我已与闻唐先生的大名，并拜读了唐先生的《李宗仁回忆录》等著作。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因研究胡适早期政治思想，唐先生的《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自然成了案头的常备著作。与唐先生谋面迟至1991年10月在香港举办的“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学术研讨会。那次会议，海内外胡适研究专家会聚一堂，共同就胡适研究这一

专题做一探讨。在出席会议的人员中，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位，但会议破例安排第一位发言。第一次面对名家云集的现场，心里面不免打鼓。唐先生是出席会议的海外学者中年龄最长的一位，但他丝毫没有倚老卖老的架子，会上发言幽默风趣、妙语连珠，令与会者忍俊不禁；会下与人交流随和，显示了一个大家的风范。从那以后，在有关胡适的学术研讨会上，我们都能看到唐先生的身影。1992年夏天在北京举行的胡适学术座谈会、1993年5月在青岛举行的“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胡适”学术研讨会、1995年5月在上海华东师大举行的“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学术研讨会，唐先生亲自从美国飞来，光临会议，给这些会议的确增添了不少光彩。1996年12月中旬，唐先生访问北京期间，我特请他在北大做一讲座，这也许是他老人家在北大唯一的一次讲座。闻讯前来的师生挤满了会议室，大家争睹这位口述史学大师的风采。离京后，恰逢辞旧迎新之际，唐先生特来信致贺：

哲生教授和夫人：

月前在北京把贤伉俪忙坏了，心实不安，也叩感不尽。……

近日阅中文报，说山东大学已将全套《四库全书》输入电脑，如此则台湾的《廿四史》就是小巫了。兄如能查出《四库》何时发售，我也想买一套也。请查查看。这是件惊人的文化大事。……

贵系贵院诸领导和老友，敬请代为致意道谢；近史所诸老友亦烦便中致意。上次吃饭时太匆忙，找不到空座，未能陪诸老友多谈谈，心中尤不安也。匆上敬贺

春节快乐！

德刚 九七，一，七

1999年5月北京大学主办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参与会议筹备，自然也忘不了邀请唐先生大驾光临。那次会议，中外专家会聚燕园，研讨五四，这是一次高层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安排在大会最后一场发言的四位中外学者分别为王元化、唐先生、张岂之和林毓生，均为学林高手，他们将会议推向高潮。唐先生提交论文的题目是“论五四后文学转型中新诗的尝试、流变、僵化和再出发”，他的发言幽默诙谐、铿锵有力，博得了与会者热烈掌声。

唐先生身体不佳的消息，我早已耳闻。2002年2月20日我乘途经纽约时，约W君前往唐先生家看望他老人家，这是我与唐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关于此行，我的日记中有简略记载：

下午一时多到达唐家。看得出唐先生身体虚弱，去年十一月中旬他因

中风住院，几失去记忆，现在仍不能吃东西，身体颇弱，走路须借助推轮。与我两年前相见时判若两人。

日记中所指两年前与唐先生相见，系指 2000 年 10 月我第一次赴纽约参加“华族对美国的贡献”学术研讨会，会后与唐先生会见之事。当时，唐先生已届 80 高龄，仍能自己驾车。他主动请缨带我去参观西点军校。从纽约到纽约州的西点军校，小车运行需 2 个半小时，我担心他的身体受不了如此长的运行，但老人家兴致很高，硬说没有问题，于是两人结伴前去。当时我感觉唐先生开车有兜风的感觉，一路健谈，毫无倦意。下午从西点军校回来后又将我送回纽约，并陪我一起与李又宁教授吃了晚饭，才偕夫人回家。其精力之旺盛，令我极为敬佩。

从那以后，我与唐先生再未谋面。2002 年圣诞节时，唐先生大病初愈，他偕夫人吴昭文寄来一新年贺信，因此信颇能见出唐氏写作风格，故照录如下：

欧阳哲生教授和夫人：新年快乐！

时已一载，弟卧病经年，承好友不遗在远，纷辱函电慰问，甚或驾临敝庐，并馈赠各种礼品，隆情厚谊，弟阖家均叩感不尽。诚惶诚恐，愧不敢当，日月如梭，一年已逝，每念盛情，时萦魂梦。上次生病，曾住院两次，稍愈后，又去加州儿女处，作较长期休养，然终因年高体弱，只能带病延年，迄今仍不能开车，不能久坐，年愈八旬，本该如此，夫复何言？然弟身体素无疾病，自觉粗健，初不意偶一发病，竟狼狈若此，实出个人意外，然病后细思，颇觉罪有应得。盖平时自信，身强力壮，起居饮食，素不谨慎，更无条理，一旦发病，认识已晚。如今自庆，未翘辫子，还能与诸兄姐，通信拜年，实为始料所不及，然亦愿以个人生病经验，为诸兄嫂报告，我国固有，与洋人新倡的，养生之道，都颇有足学者。年高老友各必注重健康，饮食起居，都应特别注意，才是长保福录之道。我兄嫂健康极佳，令弟羡慕之极，至盼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则期颐之祝，可预贺也，敬祝阖府健康！

圣诞快乐，新年如意！

唐德刚 吴昭文 敬贺 2002 年

PS：北京老友相遇于途，或相逢于会场，至盼代候起居。弟因疾病缠身，就无能力拜年了。兄来纽约，因病未能招待，尤感心疚，乞恕为感。

2004 年 2 月我前往旧金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参加一学术研讨会时，给先生打了一个电话，表示问候，另给他寄了一笔稿费。同年 9 月前往纽约参加“哥大与中国”学术研讨会时，再次与唐先生通了一个电话。本来



那次会议邀请唐先生参加，但他因病重不便外出，未能遂愿。在电话中，唐先生以嘶哑的安徽口音表示，因病不能与会同朋友们见面，甚感歉意。我感到老人家是一个仁厚的长者。真是人之将老，其言也哀！

唐先生一生治史主要有三项成就：一、中美关系史。他的博士论文《中美外交史 1844——1860》(英文版)、《中美外交百年史 1784——1911》(中、英文版)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二、口述历史。1957年初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部成立，主持这项工作的是韦慕庭教授(Clarence Martin Wilbur)，下属工作人员为夏连荫(莲英，英文名Julie How)和唐先生。在中国口述历史部，唐先生先承担《胡适口述自传》(作于1957年)、《李宗仁回忆录》(作于1958年9月至1965年6月)、《顾维钧回忆录》(1960——1962年，只参与其中部分工作)等人物的口述自传撰写工作。张学良晚年获自由后，重出江湖，唐先生又曾重拾这一工作，有志于作一部《张学良口述自传》，经刘绍唐先生撮合，1990年1月至5月间在台北北投张学良寓所和亚都饭店采访张学良，先后录下11盒录音带，惜这一工作因故中止。如今这些著作在海峡两岸均已出版，且重印多次，在史学圈内和广大读者中产生极大反响，佳评如潮，被视为口述史学的典范。唐德刚因此得享“中国现代口述历史的开拓者”、“口述历史大师”的盛名。除自己身体力行外，唐先生在海外还创建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会，带领更多的年青学者投入这项工作。唐先生之所以热衷这项工作，是以为这是一项抢救史料的工作。三、中国近代史研究。1972年唐先生从哥大图书馆中文部主任转往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教授，其工作重心遂转向历史教学与研究，据他自述，他在纽大上过“世界文化史”、“亚洲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等十余门课程，中西历史治于一炉，可谓上下五千年、纵横三千里无所不讲、无所不通。1994年他从纽大退休，专事撰写《中国近代史》工作，已成《晚清七十年》(五册)、和民国史第一册《袁氏当国》，这是一部极具个人风格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堪称“空前绝后”之作。

在从事历史教学、研究之外，唐先生还撰有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自传体回忆录《五十年代底尘埃》，胡适研究著作《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等著。唐先生擅长演讲，他讲话带有浓厚的安徽老家口音，引经据典、纵横捭阖、随意所至、无所不谈、毫无拘束。唐先生是一个性情中人，结交朋友似也是如此。与他相交，你会感到这是一位可敬可爱的老顽童，给人以强烈的亲和力、磁性力，毫无老气横秋之做作，难怪他颇得人缘，在海峡两岸、大洋彼岸有不少各界的朋友。1992年夏天他来北京开会，“失踪”两天，吴健雄特从美国打电话到北京来寻找，在

朋友中引为笑谈。

唐先生身处异邦，却有着一颗不眠的中国心。他自述：“笔者不敏，学无专长，加以流落异域数十年，打工啖饭，颠沛流离，一言难尽。然正因身体历艰难而幸免于浩劫，对祖国这一迷团，终未忘情，总是对所见兴亡，有所领悟。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因对数十年之所学，与殚精竭虑之思考，亦不敢过分妄自菲薄。”从早年投身撰写中国口述历史工作，为中国现代史抢救“活的历史”；到晚年撰写《晚清七十年》，以大手笔勾勒中国历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从其在海外大力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发起民间对日索赔、寻访慰安妇活动，到他临终前将其藏书捐给母校安徽大学，表达对故乡的一片依恋之情，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中国情怀。唐先生为人处世，若如其名，德刚并济；而作文言谈，又如其人，活泼可亲。他遗嘱将其骨灰撒向大海，可见其心怀之宽广！一生得以结识这样一位老友，毕竟是吾辈之缘、之幸！

2009年11月3日深夜于北京海淀蓝旗营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胡适全集》失收的一封复日本学者的信

石立善

—

一年多以前，笔者在编写整理《日本胡适研究论著目录稿》及《续编》<sup>①</sup>时，发现胡适（1891—1962）著作的日译本中收录了一封写给日本学者今关天彭（1884—1970）的书信，而《胡适全集》失收<sup>②</sup>。今将此信内容加以整理，并略述胡适与今关天彭的交往及通信背景。

胡适复日本学者今关天彭的书信，载于今关译《支那禅学の变迁》的书末，全文如下：

<sup>①</sup>石立善编《日本胡适研究论著目录稿（1970～2008）》、《日本胡适研究论著目录稿续编（1920～1969）》（《胡适研究通讯》第3期、第4期，第29—37页、第24—29页，北京：胡适研究会，2008年8月、11月）。

<sup>②</sup>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编委会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

今关先生：

示悉。

先生如要译拙著，但请自由翻译，不必征求我的同意。印出后，乞赐一份，为惠多矣。

铃木大拙先生已往英国，想今年可归。我本年七月十四日从上海赴美洲，在东京有一日句留，或可与先生相见也。

匆匆敬问

大安。

胡适敬白

廿五，六，廿二。

这封写于 1936 年 6 月 22 日的书信，不仅《胡适全集》第 26 册《书信》“1936 年”部分失收，而且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sup>①</sup>（校订版）第四册“民国二十五年（1936）丙子”条、《胡适全集》第 44 册所收季维龙编《胡适著译系年（二）》“1936 年”条皆未记载此事。

## 二

《支那禅学の变迁》是胡适有关禅学论文合集的日译本，由今关天彭翻译，1936 年 9 月于东京的东方学艺书院出版。日译本共分六章，分别译自《胡适文存》第三集与《胡适论学近著》中所收的《禅学史纲领》、《禅学古史考》、《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菩提达摩考》、《楞伽宗考》、《荷泽大师神会传》<sup>②</sup>。通过这封胡适的复信可知，今关天彭曾就翻译禅学论文一事致函胡适，欲征得著者本人的同意及授权，而得到了胡适爽快的应允。

今关天彭<sup>③</sup>（IMAZEKI Tenpo），1884 年 6 月生于千叶县<sup>④</sup>，名寿磨，号天彭，笔名天彭生。“天彭”则取自四川的古代地名（即今之彭州市），天彭是唐代以来牡丹的著名产地，因今关家有牡丹园，故其少年时期起就以天彭作为雅号。今关天彭自幼于其祖父琴美开设的汉学私塾里遍读《四书》、《五经》及《唐诗选》、《十八史略》、《蒙求》、《唐宋八家文》、《纲鉴

<sup>①</sup>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年 11 月。

<sup>②</sup>《荷泽大师神会传》是要旨翻译。

<sup>③</sup>今关天彭的生平，依据座谈笔录《今关天彭先生を囲んで》及笔录卷首所附今关自撰的略传（《东方学》第 33 辑，第 157—175 页，东京：东方学会，1967 年 1 月）。

<sup>④</sup>关于今关天彭的生年，日中学界另有 1882 年的说法，盖误也。

补》等汉文典籍，十一岁起作汉诗。今关十七八岁时屡赴东京，接受了汉文学家石川鸿斋（1833—1918，名英）的汉诗指导。1907年，今关成为《国民新闻》及《国民杂志》的记者。其后，今关又从森槐南（1863—1911）学作汉诗，从森川竹磬（1869—1917）学填词。今关的汉诗在当时颇有名气，芥川龙之介《江南游记》<sup>①</sup>就曾引用今关的诗句——“休言竟是人家国，我亦书生好感时”。

今关原本计划赴北京游学，由于受到德富苏峰（1863—1957）与国府犀东（1873—1950，名种德）二人的推荐，1914年赴朝鲜总督府任职，编纂《日韩并合颠末》一书。1918年，今关天彭辞去朝鲜总督府的职务来到中国，并在三井合名本社的支持下，于北平成立“今关研究室”，主要研究中国的文学、艺术及文化，调查中国社会的现状等。然而由于今关所持的态度受到日本军部的忌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时被迫离开中国。因为今关已经安家于北平，故此后亦往来日中之间，游览各地，颇受日中两国政府的重视其后，今关在重光葵（1887—1957）出任驻华大使<sup>②</sup>与日本外务大臣期间，先后任其顾问。1970年10月于东京去世。

今关天彭一生笔耕不辍，著作颇丰，著有《东京先儒扫苔录》<sup>③</sup>、《支那人文讲话》<sup>④</sup>、《支那商工业の变迁》<sup>⑤</sup>、《燕山草堂说诗》（第一編）<sup>⑥</sup>、《骏河と临济禅》<sup>⑦</sup>、《中支汗漫游话》<sup>⑧</sup>、《清代及现代の诗文界》<sup>⑨</sup>、《清代及び现代の诗余骈文界》<sup>⑩</sup>、《清代及现代の支那文学界》（第二編）、《骏远之诗界》、《近代支那の学艺》、《法帖丛话》、《所藏本朝诗集解题》（第一）、《支那近情管見》、《中国文化入门》、《浦上玉堂》、《天彭诗集》十二卷等，编有《宋元明清儒学年表》、《支那戏曲集》

<sup>①</sup>《芥川龙之介全集》第八卷所收，第254页，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6月。

<sup>②</sup>1942年今关因病归日。

<sup>③</sup>东京：政教社，1913年12月。

<sup>④</sup>东京：二酉社，1919年9月。

<sup>⑤</sup>北京：今关研究室，1920年。

<sup>⑥</sup>北京：今关研究室，1924年。

<sup>⑦</sup>静岡：静岡谷岛屋书店，1924年。

<sup>⑧</sup>北京：今关研究室，1924年。

<sup>⑨</sup>北京：今关研究室，1925年。

<sup>⑩</sup>北京：今关研究室，1926年。

同上。

静岡：静岡谷岛屋书店，1935年。

东京：民友社，1931年12月。

东京：民友社，1932年。

东京：今关天彭，1935年10月。

东京：今关天彭，1936年。

东京：元元社，1955年12月。

东京：稀観书刊行会，1972年10月。

今关自费出版。

北京：今关天彭，1919年9月。

①、《支那戏曲物語》（上下卷）<sup>②</sup>，译著有《东洋画论集成》（上下卷）<sup>③</sup>、《近二十年来の支那外交》<sup>④</sup>（王正廷著）、《宋诗选》<sup>⑤</sup>（与辛岛骁合译）等。其中，《宋元明清儒学年表》最近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再版<sup>⑥</sup>。由此可知，今关的研究方向主要有四：一曰中国的诗文、词曲、书画，二曰清代及民国的文学、学术、文化，三曰包括工商在内的社会状况，四曰日本的儒学与禅学。今关所撰《日本流寓の明末诸士》<sup>⑦</sup>一文对明末流寓日本的遗民如朱舜水、独立和尚、陈元贇、张非文及黄宗羲的日本乞师等事迹做过深入的研究，一部分还被译成中文<sup>⑧</sup>，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总体而言，在民国时代的中国，今关的诗文词曲研究影响较大，如词学家龙榆生（1902—1966）早年就是因为受到了今关所撰《清代及现代的诗余骈文界》的刺激而倾力于词学研究的<sup>⑨</sup>。

至于今关天彭翻译胡适禅学论文的原因，他主要出于对日本的“五山文学”及相关禅学抱有的浓厚兴趣，以及将胡适的研究尽快介绍给日本学界的愿望<sup>⑩</sup>。此外，今关自身也研究禅学，撰有《骏河と临济禅》一类的著述，后来今关在禅学家石井光雄（1881—1966）的花甲纪念文集中还撰有《初期の禅宗》一文。

今关天彭居住中国十余年，期间“巡游各地、历访名士”，与中国政界、学界等各方人士有过广泛的交往，除了胡适以外，今关还与陈宝琛、熊希龄、金绍城、郁曼陀、董康、李宣倜、蔡元培、陈衡恪、陈三立、康有为、黄侃、章炳麟、沈曾植、郑孝胥、吴昌硕、李宣龚、鲁迅、郁达夫等有过从。值得一提的是，今关天彭的名字还在曾留学日本的鲁迅、郁达夫的日记中频频出现，可见往来比较密切。今关自幼熟读中国古典，精通汉语，又能作诗填词，穿梭于民国学界新旧各派之中，加上三井财团对其研究调查的资助，使其能够长期近距离地观察与接触中国，阅历极其丰富，因此他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对当时中国各界情况了如指掌，而当时来华留学的日本学生或“游学”的日本学者皆无法望其项背。当时

① 东京：东方时论社，1917年1月。

② “民族教养新书”，东京：元元社，1955年2月。

③ 东京：读画书院，1915年12月、1916年1月（东京：讲谈社，1979年2月再版）。

④ 北京：今关研究室，1928年。

⑤ “汉诗大系”第十六卷，东京：集英社，1966年3月。

⑥ 2002年4月。

⑦ 《近代支那の学艺》所收，第335—474页。

⑧ 罗霏霖译《明末潜渡日本之张非文》（译自《日本流寓の明末诸士》第五节，《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3卷第2期，第89—105页，1934年12月）。

⑨ 参照《龙榆生词学论文集》卷末龙厦材《后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

⑩ 《支那禅学の变迁》序。

《积翠先生华甲寿纪念论纂》所收，第651—674页，东京：积翠先生华甲寿纪念会，1942年8月。

唯一可以与其相提并论的，可能就是另一位长期居住在北平的中国通桥川时雄（1894—1982）。

今关天彭是胡适的旧友，他们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十四年前。据《胡适日记》记载，今关曾于1922年8月26日<sup>①</sup>、11月19日<sup>②</sup>两度拜访胡适。今关8月26日来访时，胡适日记对两人的谈话内容记载得比较详细。当日，今关送给胡适一部自己编写的《宋元明清儒学年表》，两人交谈甚久。今关说：“二十年前，日本人受崔述的影响最大，近十年来，受汪中的影响最大：崔述的影响是以经治史，汪中的影响是以史治经。”胡适对此似乎不以为然，他在日记里写道：“其实日本人史学上的大进步大部分都是西洋学术的影响，他未免过推汪中了。”其实胡适对于今关的话有所误解，因为今关所说的“日本人”是指日本老派的汉学家，而胡适所说的“日本人”则是当时受过西方史学训练的学院派学者。今关又说“崔述过信‘经’”，而胡适则认为“此言甚是”。今关还提到“日本史学与《本草》两项成绩最大。”胡适也谈了不少自己的看法：“我们的使命，是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我们只认方法，不认家法”，“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功夫”，“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家”，“日本史学的成绩最佳。从前中国学生到日本去拿文凭，将来定有中国学生到日本去求学问”。胡适的谈话，反映了这一时期他抱有的一些看法。

于此再回到胡适给今关的复信，对相关内容略作探讨。胡适在信中提到：“铃木大拙先生已往英国，想今年可归”，可知禅学家铃木大拙（1870—1966）也是今关的相识。据铃木大拙的《年谱》<sup>③</sup>记载，铃木于1936年6月2日自日本出发，乘船经由美国，同月30日抵达英国伦敦，出席了7月2日至18日在伦敦召开的世界宗教信仰会议并作讲演。铃木在欧洲逗留期间，曾前往大英博物馆与巴黎国立图书馆调查敦煌出土的禅宗文献，还在欧美各大学做了数场学术讲演，翌年1月8日才返回日本。此时铃木的动向，与胡适信中所言大致相符。

胡适信中又云：“我本年七月十四日从上海赴美洲，在东京有一日句留，或可与先生相见也。”根据《日记》的记载<sup>④</sup>，胡适于这一年的7月14日早两点乘船出发，两天后即7月16日早晨六点半抵达日本神户，于

<sup>①</sup>《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三卷“1922年8月26日（Sat.）”条，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12月。

<sup>②</sup>《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十七册所收日记影印本“1922年11月19日（S.）”条，第183页，合肥市：黄山书社，1994年12月。

<sup>③</sup>《铃木大拙全集》（增补新版）第四十卷所收桐田清秀编《年谱》，第154—155页，东京：岩波书店，2003年12月。

<sup>④</sup>参照《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三卷“1936年7月14日”、“7月16日”、“7月17日”条

当日上午乘电车先到大阪，再坐车赶赴东京，又于7月17日傍晚乘汽车前往横滨，当晚十点由横滨港乘船赴美。其间，胡适在东京停留了约二十四个小时，会晤了包括旧友室伏高信（1892—1970）在内的一些日本政界人士，然其中并不见今关天彭的名字，可知胡适此次途经日本行程匆匆，未能与今关如愿再会。

又，关于今关翻译的《支那禅学の变迁》，十七年后的胡适日记中亦言及此书。1953年重访日本的胡适，得知铃木大拙的学生Richard De Martino新近购得此书，于是在5月30日的日记里记录此事，并写道：“末页有我给今关的一封信，许他翻译”<sup>①</sup>，指的就是本文所举的这封佚信。

## 结 语

自1920年代初起，日本学界就已开始关注胡适，陆续介绍其学说及影响，同时还翻译了大量的相关著述。胡适著作日文翻译的单行本，最早是1923年2月出版的桥川时雄译《最近の支那文学》<sup>②</sup>，翻译的是《五十年来来的中国文学》。其后，留学于早稻田大学的杨祥荫<sup>③</sup>与内田繁隆（1891—1984）合作翻译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sup>④</sup>，井出季和太（1880—？）翻译了《先秦名学史》<sup>⑤</sup>，吉川幸次郎（1904—1980）翻译了《四十自述》<sup>⑥</sup>，而有关胡适的单篇文学作品及论文的翻译则为数更多。笔者发现胡适专著的日文翻译，主要集中在1940年以前，这一方面说明了早年胡适所受日本学界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胡适与日本学界的频繁的交往情形。本文所论的这封佚信，正是这两种情况的如实反映。

（作者工作单位：日本京都女子大学）

<sup>①</sup>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七卷“1953年5月30日”条。

<sup>②</sup> “现代支那学术丛书”第2编，东京：东华社，1923年2月。

<sup>③</sup> 杨祥荫，号励三，陕西长安人，归国后曾执教于西北大学。

<sup>④</sup> 《古代支那思想の新研究》，东京：岩松堂，1925年9月。（1939年4月岩松堂再版。“亚洲学丛书”第39卷，东京：大空社，1998年2月影印再版）。

<sup>⑤</sup> 《胡适の支那哲学论》，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7年4月。（“亚洲学丛书”第40卷，东京：大空社，1998年2月影印再版）。

<sup>⑥</sup> 大阪：创元社，“创元支那丛书”第1卷，1940年3月。（后改题为《胡适自传》，收入“养德丛书 外国篇”第1008册，丹波市町：养德社，1946年12月。又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东京：筑摩书房，1970年7月）。

# 胡适红学补遗

## 刘广定

胡适红学的研究者宋广波先生，几年来著（编）有《胡适红学年谱》（2003，2009年出版修订本），《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2005），《胡适与红学》（2006）与《胡适批红集》（2009）等书。各书除了他个人的诠释外，更极富史料辑存的价值。唯胡适有关红学的观点与研究历程，散见多处，很不容易搜集完全。2001年笔者为纪念胡先生110岁冥诞，曾写过一篇《胡适红学遗珍》（拙作《大师遗珍》页53-59，文汇出版社，2008年）。现再举两个众多红学家都忽略的例子。

一是胡适1956年7月底去波士顿访友，8月1日的日记说：

十点到Boylston Hall看书，事先没准备，故仅看了钱载《蘅石斋诗文集》，查他提“雪琴”or“雪芹”的行乐图的诗，但无所获。

按，Boylston Hall是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的一部分，藏有钱载的诗文集，而钱载是原为李祖韩所收藏相传是“曹雪芹画像”手卷上的一位题诗人。胡适早于民国18年（1929年）4月20日在上海的“全国美术展览会”上见过此画，当时就认为不是“曹雪芹”的画像。事隔二十几年，还想到去查阅钱载的《蘅石斋诗文集》中是否有题“雪琴”或“雪芹”的诗。可见其治学之认真。

二是1959年2月5日胡适写给雷震的一封信，载于胡适与雷震往来书信选集《万山不许一溪奔》（2001年出版）中。表示他觉得赵冈欲在《自由中国》杂志发表的“红楼梦与脂砚斋”长文，有许多错误而不适合发表。这封信较长，故只节录一段如下：

赵冈先生根据我记载《甲戌本脂砚斋评本》的评语“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的话，壬午是乾隆二十七年，除夕当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所以赵君此文中也接受了“雪芹死在一七六三年二月（壬午除夕）”的结论。他大概没有看见周汝昌考证《红楼梦》的文字。周



君在民国三十六年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敦敏的《懋斋诗钞》，其中各诗都依年月先后钞写。其中“癸未”(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还有〈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一首。故周汝昌断定脂砚评语的“壬午除夕”是“癸未除夕”的误记。癸未除夕等于西历一七六四年二月一日。敦诚〈挽曹雪芹〉诗下注“甲申”，即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可以助证周君之说。故我现在也相信雪芹死在癸未除夕。甲戌本此条批语未有“甲午八月泪笔”六个字。甲午是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在雪芹死后十一年。十一年后回忆，把“癸未除夕”误记为“壬午除夕”，是很可能的事。

故知直到 1959 年二月胡适仍相信周汝昌 1947 年底依据《懋斋诗钞》中《小诗代柬寄曹雪芹》一诗为癸未年做，而以曹雪芹死于“癸未除夕”。但随后，赵冈 1959 年 3 月撰文指出《懋斋诗抄》之编年不正确(《红楼梦考证拾遗》，香港高原出版社，1963 年)。可能他告诉了胡适，胡适乃亲自检阅影印的《懋斋诗钞》，也认为《懋斋诗钞》编年紊乱不足为信。1961 年 2 月 17 日胡适给高阳的长信里说：

...我看了这个钞本的原稿子，似不是严格依年月编次的：又不记叶数，装订时更容易倒乱。“小诗代简”一首...这好像是癸未(乾隆廿八年)春天邀雪芹三月一日(上巳前三日)去小酌的“小诗代简”。发此“代简”时，去雪芹死(壬午除夕)止有一个半月的光景，可能他还不知道雪芹已死了。...故我现在的看法是；敦敏的“代简”诗即使是“癸未”二月做的：未必即能证实雪芹之死不在壬午除夕。

因此，胡适才又恢复了他早年据“甲戌本”所推定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之说。由此也可见胡适治学尊重证据的态度。

但是，据周祜昌、周汝昌合着《石头记鉴真》(1985 年)中说：

五十年代文学古籍刊印社影印《懋斋诗抄》竟将底本的页码次序妄行改变(后闻系某责任编辑所为)，以致造成了研究上的一个障碍。(争论雪芹生卒年时竟成了“论证”的一个要点)。(页 33-34)

很可能就是针对胡适“又不记叶数，装订时更容易倒乱”而言。惜他们两位并没指出究竟是那些页码次序遭到改变。据笔者所知，赵冈曾看过哈佛

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的《懋斋诗钞》清抄本（即原在燕京大学图书馆的本子），并未指出有那些诗的顺序不同，故目前无法确知是否真有所谓“研究上的一个障碍”。

胡适对 1955 年影印的《四松堂集》也表示不满意，据《胡适批红集》的书影(页 11)，他在书名旁写道：

此本是刻本，原藏至德周氏。他们为什么不用我送给北大的原稿本？难道他们不知道我此本在北大吗？

三年前（2006）这个“原稿本”终于以《四松堂集付刻底本》为名影印发行了。在这本书里看到了胡适风趣的一面，也看到他为人厚道的一面。民国 11 年(1922)4 月 25 日胡适在书中自记：

今天买成此书。我先已把书中的重要材料都考证过了，本无出重价买此书的必要；但书店的人为我访求此书，功劳不少，故让他赚几个钱去。

因此，他出了“叁拾圆”买下这部一函五册的《四松堂集》。当时，胡适和朋友们所办的《努力周报》，全年 52 期只要“大洋一元”。可见确是“重价”了。

（作者系台湾大学化学系名誉教授）

## 《胡适全集》日文记载举误

石立善

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编委会编辑整理的简体字版《胡适全集》<sup>①</sup>四十四卷于 2003 年 9 月出版。《胡适全集》（以下略称《全集》）是迄今为止收录胡适（1891—1962）著述最多的一套集子，《全集》的出版不仅在中文学界反响热烈，而且在海外汉学界亦引起了普遍关注。那么，《全集》

<sup>①</sup>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是否能够成为今后胡适研究的通行本呢？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因为目前《全集》存在着大量无法忽视的问题，如文章的失收与删节，如信函的重复与混乱，如文字与标点的衍脱错讹等。

上述之外，笔者发现《全集》在整理日文关系的记载方面也有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书信”、“日记”、“著译系年”三个部分。关于“书信”、“日记”部分，其致误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出自胡适本人之手，二是整理者的问题。相比之下，整理者在日文辨识、罗马字拼读及注释等方面的技术性问题更多一些。至于“著译系年”部分，主要是一些人名与出版信息的错误。本文拟举日文记载的讹误 24 条，各条依次列出《全集》卷数、卷名、篇名、页数、原文以及笔者所加的“按语”，试为勘误，以供读者及《全集》再版时参考。

#### 1、第 26 卷《书信》“1961 年”，《复石璋如》，第 571 页

原文：但你寄的桥本凝胤的《南都佛教及禅学研究》三七、三八还没有到，先谢谢你。

按：《南都佛教》是日本学者桥本凝胤的著作<sup>①</sup>，而《禅学研究》则是临济宗大学禅学研究会主办的杂志，两者并非一书，不可混为一谈。“《南都佛教及禅学研究》三七、三八”，标点当改为：“《南都佛教》及《禅学研究》三七、三八”。

#### 2、同上

原文：今天收到横井（柳田）圣山寄赠他的“灯火の系统”日本文原拔刷本。

按：“灯火の系统”，当作“灯史の系谱”，《灯史の系谱》是横井（柳田）圣山寄赠给胡适的一篇禅学论文<sup>②</sup>。

#### 3、第 26 卷《书信》“1959 年”，《致入矢义高》，第 275、276 页

原文：我在三十年前，本允诺高濂先生把《神会遗集》赶写了送给他收入《大正藏》。……三十年前，高濂先生等都不重视我要访寻的神会，所以“大索”在当时是不可能的。

按：文中两处“高濂”，当作“高楠”。胡适手稿即如此<sup>③</sup>，应属笔误。“高楠”，即佛教学家高楠顺次郎<sup>④</sup>。

#### 4、第 29 卷《日记》“九年二月四日（星期三）”，第 75 页

<sup>①</sup> 东京：岩波书店，1934 年 2 月。

<sup>②</sup> 载《日本佛教学会年报》第十九号，第 1~46 页，京都：1954 年 4 月。

<sup>③</sup> 《胡适手稿》第八集卷三所收影印本，第 442、444 页，台北：胡适纪念馆，1970 年 6 月。

<sup>④</sup> 参照《神会和尚遗集：胡适校敦煌唐写本（增补本）》序，台北：胡适纪念馆，1968 年 12 月。

原文：早坂二郎 (Hayashka Jiro)、平贞藏 (Taira Teiza)

按：“Hayashka Jiro”，当作“Hayasaka Jiro”；“Taira Teiza”，当作“Taira Teizo”。胡适日记手稿皆不误<sup>①</sup>。

5、第 29 卷《日记》“十一，八，廿六 (Sat.)”，第 725 页

原文：日本学者今关寿磨来谈。他送我一部自作的宋元明清《儒学年表》。

按：书名号有误，当标作：“《宋元明清儒学年表》”。日记手稿所标出的书名线不误<sup>②</sup>。此书是今关寿磨于 1919 年 9 月在东京出版的著作。

6、第 30 卷《日记》(1926)“October 8(Friday)”，第 362 页

原文：近有日本学者宇野哲人 (Ono) 在 B.M. 看敦煌之中国古书卷子，Giles (贾尔斯) 选了一些给他看。

按：“Ono”，当作“Uno”，日记手稿已误<sup>③</sup>。

7、第 30 卷《日记》(1926)“October 12 (Tuesday)”，第 374 页

原文：昨夜，读 Okakura hakuzo (阜子白石) 的 *The Book of Tea* (《茶经》)。

按：“Okakura hakuzo”，当作“Okakura kakuzo”，日记手稿已误<sup>④</sup>。又，整理者所标注的人名“阜子白石”是错误的，*The Book of Tea*<sup>⑤</sup>的作者乃冈仓天心，本名觉三 (かくぞう)。

8、第 31 卷《日记》“十七，九，一 (Sat.)”，第 240 页

原文：读葛锡祺 (澄衷同学) 译的菊池宽的《再和我接个吻》(第二度/接吻)。

按：日文书名“第二度/接吻”，当作“第二度ノ接吻”。日记手稿不误<sup>⑥</sup>。

9、第 32 卷《日记》“廿，七，十五”，第 121 页

原文：晚上日本人笠井重治 (I. KaBai) 邀吃饭，有市长周大文等。

按：“I. KaBai”，当作“J. KaSai”。日记手稿不误<sup>⑦</sup>。

10、第 32 卷《日记》“June 22, 1933.”，第 218 页

原文：那须 Nasu 茂木总兵卫 Sokei Mogi  
高柳 Takayanagi 蜡山正道 Masamichi Royasa  
前田 Macda

<sup>①</sup>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十四册所收影印本，第 239 页，合肥：黄山书社，1994 年 12 月。

<sup>②</sup> 《胡适的日记 (手稿本)》第三卷所收影印本，台北：远流出版社，1990 年 12 月。

<sup>③</sup> 《胡适的日记 (手稿本)》第五卷所收影印本。

<sup>④</sup> 同上。

<sup>⑤</sup> Edinburth: T. N. Foulis, 1919.

<sup>⑥</sup> 《胡适的日记 (手稿本)》第七卷所收影印本。

<sup>⑦</sup> 《胡适的日记 (手稿本)》第十卷所收影印本。

按：“Sokei Mogi”，当作“Sobei Mogi”；“Masamichi Royasa”，当作“Masamichi Royama”；“Macda”，当作“Maeda”。日记手稿皆不误<sup>①</sup>。

11、同上，第 219 页

原文：鹤见高柳提起京都（Kyoto）大会时的中日两团的小组会商，后来毫无结果。

按：鹤见与高柳乃二人，两姓之间当加顿号。

12、第 32 卷《日记》“廿三，二，十五（Th.）”，第 311 页

原文：他说，现时日本的一个新兴领袖为创立国维会（Koknikai）的安冈正笃（Yasuolsa），年三十六岁。

按：“Koknikai”，当作“Kokuikai”，日记手稿已误。“Yasuolsa”，当作“Yasuoka”，日记手稿不误<sup>②</sup>。

13、第 32 卷《日记》“廿三，十，十四”，第 401 页

原文：有日本青年学者小川，山室，目加三人来谈。

按：“目加”，当作“目加田”。日记手稿已误<sup>③</sup>。“目加田”即中国文学家目加田诚。

14、第 32 卷《日记》“廿五，七，十七”，第 573 页

原文：在座者，有山川端夫、上田真次郎（Teijiyo Uyeda）、那须、鹤见祐辅、金井清、高木八尺、松方、信夫淳、浦松作美太郎、牛场。

按：“上田真次郎”，当作“上田贞次郎”，日记手稿已误<sup>④</sup>。上田贞次郎乃战前日本的经济学家，即《日记》“廿五，七，十九（Sunday）”所记“*Recent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Foreign Trade*”<sup>⑤</sup>一书的作者（同书第 575 页）。

15、第 34 卷《日记》“1951 年 9 月 7 日”，第 127~128 页

原文：我在一九二六年曾读日本忽滑谷快天（Nukwriya kaiten）的《中国禅学史》上下两册。

按：“Nukwriya kaiten”，当作“Nukariya kaiten”。日记手稿不误<sup>⑥</sup>。

16、第 34 卷《日记》“1952 年 10 月 16 日”，第 248 页

原文：水野雪子家住千叶县市川市新田 231 浮<sup>ㄎ</sup>（？）（Ukiya）和荣方。

按：“<sup>ㄎ</sup>”，日记手稿即如此<sup>⑦</sup>，然不成文字，当为“谷”字的讹写。

<sup>①</sup>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一卷所收影印本。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三卷所收影印本。

<sup>④</sup>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三卷所收影印本。

<sup>⑤</sup> Tokyo: Japanese Council,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6.

<sup>⑥</sup>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七卷所收影印本。

<sup>⑦</sup> 同上。

浮谷和荣，即著名赛车手浮谷东次郎的母亲，而水野雪子则是租住浮谷家的房子。

17、第 34 卷《日记》“1953 年 1 月 20 日”，第 272 页

原文：下午，去看国会图书馆（National Diet Library），馆长金森先生（Tokujirs Kanamori）带我去参观。

按：馆长金森即金森德次郎，“Tokujirs Kanamori”，当作“Tokujiro Kanamori”。日记手稿不误<sup>①</sup>。

18、第 34 卷《日记》“1956 年 6 月 14 日”，第 420～421 页

原文：Prof. Martin Wilbur（马丁·威尔伯教授）约我同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鲇泽岩（Iwao Aynsawa）吃饭。

按：“Iwao Aynsawa”，当作“Iwao Ayusawa”。日记手稿不误<sup>②</sup>。

19、第 34 卷《日记》“四九，四，廿八(Th.)”，第 672 页

原文：这五人是：Kanda Nobuo（神田信夫）、Okamotot Keiji（冈本敬治）、Ishibashi Hideo（石桥秀夫）、Matsumura Jun（松村淳）、Okada Hidehiro（冈田秀博）。

按：“Okamotot”，当作“Okamoto”，日记手稿不误<sup>③</sup>。又，整理者所标注的人名除了神田信夫以外，皆误。Okamoto Keiji 为冈本敬二，Ishibashi Hideo 为石桥秀雄，Matsumura Jun 为松村润，Okada Hidehiro 为冈田英弘。

20、第 34 卷《日记》“[1960], Oct. 19 (Wed.)”，第 686 页

原文：到 Marunouchi 木テ /レ，住 801 号。

按：“木テ /レ”，当作“ホテル”。“Marunouchi ホテル”，即东京丸ノ内旅馆。

21、第 34 卷《日记》“Oct. 1, 1961”，第 745 页

原文：台大校长聘请 Prof. Sasaka (Shigeo) 佐佐木（数学家）为 China Foundation Visiting Professor（中华基金会客座教授）公函，及履历著作。

按：“Prof. Sasaka”，当作“Prof. Sasaki”。

22、第 44 卷《胡适著译系年》“1946 年”，第 281 页

原文：《胡适自传》[日文稿]

吉川幸次朗译。

按：“吉川幸次朗”，当作“吉川幸次郎”。

---

<sup>①</sup> 同上。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八卷所收影印本。

23、第 44 卷《胡适著译系年》“1960 年”，第 576 页

原文：收入 1960 年东京 Na kano 出版社出版的《佛教与文化》(Susumu Yamaguchi 著)

按：此条出版信息有误。《佛教与文化》即《仏教と文化——鈴木大拙博士頌寿記念论文集》(1960 年 10 月)，此书并非 Susumu Yamaguchi 所著，而是由“鈴木大拙博士頌寿記念会”为庆祝鈴木大拙九十岁生日编纂的论文集，收录其门生、知己等人撰写的论文，其中亦包括胡适的英文论文“*An Appeal for a Systematic Search in Japan for Long-hidden T'ang Dynasty Source-materials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Zen Buddhism*”。又，此书出版机构亦非东京 Na kano 出版社，而是鈴木学术财团。

24、第 44 卷《胡适著译系年》“1961 年”，第 579 页

原文：复柳田圣三

按：“柳田圣三”，当作“柳田圣山”，柳田圣山即第 1 例所见禅学家横井圣山<sup>①</sup>。

(作者现供职于日本京都女子大学)

## 《胡适全集》错谬举例

### 宋广波辑录

1, 1 卷, 545 页, 注释说, 此文收入“1921 年 5 月亚东图书馆初版”, 错误。初版收入的是“初稿”, 而非“改定稿”。1921 年 5 月, “改定稿”还没有写成。“初稿”、“改定稿”差异极大。“初稿”的手稿见耿云志先生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十册。

2, 1 卷, 546 页, 11 行, “游金山寺时”, 原无“寺”字。

3, 1 卷, 548 页, 倒 12 行, “康熙的政治小说”, 应为“康熙朝的政治小说”。

4, 1 卷, 551 页, 1 行, “其次把”, 应为“其次, 把”。

---

<sup>①</sup>柳田旧姓横井。

- 5, 1 卷, 552 页, 7 行, “凤姐送给”, 应为“凤姐给”。
- 6, 1 卷, 552 页, 8 行, “赠送”, 应为“赠送”。
- 7, 1 卷, 552 页, 倒 6 行, 《燕下乡脞录》, 应为《燕下乡脞录》。
- 8, 1 卷, 554 页, 倒 12 行, “说大观园”, 应为“说的大观园”。
- 9, 1 卷, 556 页, 1 行, “这种牵强附会”, 应为“这种种牵强附会”。
- 10, 1 卷, 567 页, 倒 2 行, 应为“臞仙”。
- 11, 1 卷, 568 页, 12 行, “死时约”, 应为“死时, 约”。
- 12, 3 卷, 389 页, 倒 8 行, “(1831) 刻本”, 应为“(1832) 刻本”。
- 13, 3 卷, 401 页, 倒 13 行, “而与”, 据手稿, 应为“而于”。
- 14, 3 卷, 406 页, 倒 7 行, “页四十一”, 据手稿, 应为“页四十”。
- 15, 3 卷, 407 页, 5 行, “朋友批评”, 据手稿, 应为“朋友的批评”。
- 16, 3 卷, 416 页, 倒 7 行, “之流的”, 据手稿, 应为“之流作的”。
- 17, 3 卷, 417 页, 倒 6 行, “在都”, 据手稿, 应为“住都”。
- 18, 3 卷, 424 页, 8 行, “岂不是天天”, 据手稿, 应为“岂不天天”。
- 19, 3 卷, 424 页, 14 行, “对襟褂子”, 据手稿, 应为“对衿褂子”。
- 20, 3 卷, 432 页, 5 行, “见不着此本了。”, 据手稿, 应为“见不着此本了!”
- 21, 10 卷, 272 页, 最后一行, “十月底”, 应为“七月底”。
- 22, 11 卷, 4 页, 3 行, “部章”, 应为“部长”。
- 23, 12 卷, 515 页, 倒 2 行, “决不是”, 应为“决是”。
- 24, 12 卷, 517 页, 倒 12 行, “从此我们有了”后漏“一部”二字。
- 25, 12 卷, 519 页, 5-6 行, “一七五九年”, 多一“年”字。
- 26, 19 卷, 310 页, 倒 5 行, “1836”应为“1863”。
- 27, 19 卷, 354 页, 倒 2 行, “家如山”, 似乎应为“齐如山”。
- 28, 19 卷, 429 页, 5 行, “还有蒋百里、方震”, 这是大错的。因方震即蒋百里。
- 29, 19 卷, 695 页, 6 行, “雍正十三年 [1755]”, “1755”肯定错误。
- 30, 19 卷, 719 页, 倒 12 行, “1927 年”亦肯定错误。
- 31, 19 卷, 856 页, 1 行, “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 肯定有问题, 因胡适当时在上海, 不在美国。
- 32, 20 卷、625 页, 《胡评议员适之致词》这篇演讲, 编者在同页注释中说, 讲演的时间“当是 1947 年 10 月 15 日”。但这个时间应该是 1946 年, 而非 1947 年。
- 33, 20 卷、705 页, 《治学的方法》这篇讲演, 编者在同页注释中说,



讲演的时间“当在 1935 年 1 月 13 日”；713 页文末括弧也注明“1953 年”。这里，应该是“1935 年”，而绝非“1953 年”。理由：（1）此讲演来自《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而此书所收，均系 1948 年 12 月 15 日之前的胡适文献。1953 年，胡适在海外，他的文献不可能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2）此讲演中说到“在梧州讲话”，又提到“李总司令（广波按，指李宗仁）”等，显然，这是胡适 1935 年初去香港、两广时的事。（3）44 卷将此演讲系于“1935 年 1 月 13 日”。基于以上三条，我认定此演讲的时间在 1935 年。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同一篇文献为什么收入正文时所标时间与“著译系年”的时间会不一致呢？我起初想不明白，后来我想到：可能是季维龙先生编“系年”时，并未参校新编的全集前 42 卷，也未将“系年”中的篇目与全集正文对勘。因而出现这种“脱节”的情况，此类情况还有。写到这里，我就想，是否“系年”的每一篇目之下，再加上一条：“收入《胡适全集》何卷何页”。

34，20 卷，764 页，4 行，“政治、会”之“会”前，漏一字。

35，20 卷，770 页，倒 8 行，“中央宣传”，似应为“中共宣传”。

36，21 卷，目录 1，“敬告中国女子”，似应为“敬告中国的女子”

37，21 卷，339 页，《割据》的写作日期是 1925 年 2 月 18 日。

38，21 卷，341 页，《退出善后会议》的写作日期是 1925 年 2 月 24 日。

39，21 卷，398 页，倒 3 到倒 10 行，有问题。

40，21 卷，426 页，“参谋院”，应为“参议院”。

41，21 卷，428 页，注释有问题。

42，21 卷，462 页，倒 2 行，“三民主义”误作“三民主议”。

43，21 卷，479 页，“李济深”误作“李济琛”。

44，22 卷，目录 1，倒 8 行，“三月廿日四的社论”，大错。

45，23 卷之“整理说明”，第六行，“1966 年 6 月台北文星书店出版（13 册）”。请问“出版”后面是否漏了“《胡适选集》”数字？

46，“书信卷”，至少漏了三封信：（1）1921 年 4 月 16 日答顾颉刚书。此函首载 1943 年 9 月 15 日上海《学术界》第 1 卷第 2 期，见《考证红楼三家书简》又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 年第 4 期，见《〈红楼梦〉讨论通信》；收入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2 卷；又收入《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而此函之目，亦见于“系年 43 卷，页 318”。此亦是“系年”与“正文”脱节之例也。

（2）1928 年胡适致函戈公振，此函发表于《民国春秋》。

（3）1961 年 10 月 29 日致函李

敖。见《李敖自传与回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47, 1996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之《胡适书信集》，书后有一索引，查阅起来极为方便。全集“书信卷”删略了此索引，想是因为全集有“系年”的缘故吧？但我以为，倘 26 卷之后再加上这么一个“索引”，也是很好的。

48, 29 卷, 253 页, 9 行, “页 32”, 应为“页 31”。

49, 29 卷, 262 页, 倒 1 行, “棟亭”前漏“雪芹为”三字。

50, 29 卷, 340 页, 9 行, “《访菊》”后漏“《对菊》”。

51, 29 卷, 364 页, 14 行, “周立崖”应为“周立厓”。

52, 29 卷, 364 页, 16 行, “不知……”前, 漏一行小字。

53, 30 卷, 150 页, 11 行, “照六年”, 应为“熙六年”。

54, 30 卷, 544 页, 倒 7 行, “有批云”应为“眉批云”。

55, 30 卷, 545 页, 倒 13 行, “有云”应为“自云”。

56, 30 卷, 542-546 页, 标点、格式错误极多。

57, 43 卷, “少年中国之精神”, 应为“少年中国的精神”。

58, 43 卷、314 页, 《红楼梦考证》条, 此文有初稿、改定稿之区别。314 页倒 4 行, 所收, 系初稿; 315 页 15 行《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所收亦系初稿, 其他文献所收则为改定稿。“系年”似乎应该标明。因为, “初稿”与“改定稿”差别极大。

59, 43 卷、318 页, 1921 年 4 月 16 日答顾颉刚书未收入《胡适书信集》。

60, 43 卷、335 页, 倒 7 行, 应是“11 月”。

61, 43 卷、336 页, 倒 9 行《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漏“胡适”二字。

62, 43 卷, 345 页, 第三行, 应该是《胡适手稿》, “稿”字印错了。

63, 43 卷, 345 页, 倒 11 行, 应该是“1922 年”, “年”字印错了。

64, 43 卷, 352 页, 《跋〈红楼梦考证〉》, 又载亚东版《红楼梦》第二版以及以后各版。

65, 43 卷, 353 页, 9 行, “19 卷第 8 卷”, 大错。

66, 43 卷, 366 页, 8 行, 应该是《胡适文存》, 而非“文集”。

67, 43 卷, 369 页, 倒 6 行, 应是“第 12 期”。

68, 43 卷, 371 页, 2 行, 应是“编辑余谈”。

69, 43 卷, 372 页, 《题半农买的黛玉葬花画》一诗的写作日期, 不对。我有一小文, 专门考此问题。

- 70, 43 卷“一篇绝妙的平民文学”与前一篇, 位置应该颠倒。
- 71, 43 卷, 508 页, “致韦莲司”, 时间应该韦“1927 年 2 月 1 日”, 而绝非“1917 年”。
- 72, 43 卷, 527 页, 《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 又载 1928 年以后的亚东版《红楼梦》。
- 73, 43 卷, 528 页, 倒 8 行, 漏了“胡适学术文集”数字。
- 74, 43 卷, 384 页, 12 行, 应是“编辑余谈”。
- 75, 43 卷, 388 页, 3 行, 应是“编辑余谈”。
- 76, 43 卷, 399 页, 6 行, 应是“第 35 号”。
- 77, 43 卷, 401 页, 倒 8 行, 应是“胡适先生”, 无“之”字。
- 78, 43 卷, 413 页, 4 行, “早该走了”应是“早就该走了”。
- 79, 43 卷, 414 页, 5 行, 应是“第 44 期”。
- 80, 43 卷, 424 页, 11 行, “南高峰”应是“南高峰上”。
- 81, 43 卷, 441 页, 倒 11 行《小诗》, 又收入《胡适的日记》。
- 82, 43 卷, 485 页, 倒 8 行, 详细日期是 9 月 29 日。
- 83, 43 卷, 536 页, 《校勘学方法论……》一文, 又收入《胡适文存》四集。按, 所有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的文字, 均应该注明收入《胡适文存》四集。
- 84, 43 卷, 548 页, 《答单丕》, 时间应该韦“5 月 25 日”, 而非“23 日”。
- 85, 43 卷, 555 页, 《祝贺女青年会》, 还有别的出处。
- 86, 43 卷, 586 页, 最后一篇, 又收入《胡适文存》三集。
- 87, 43 卷, 591 页, 第四行, 应该是“三集”, 而非“二集”。
- 88, 43 卷, 601 页, 倒 6 行, 应该是“4 月 10 日”。
- 89, 43 卷, 607 页, 倒 4 行, 应该为“太东书局”, 而非“太东”。
- 90, 43 卷, 609 页, 第十二行, 《胡适研究丛录》非出版于 1998 年。
- 91, 43 卷, 609 页, 倒 7 行, 似乎不是“五十岁生日”, 而是“五十生日”。
- 92, 43 卷, 614 页, 1930-09-27 信, 未收入《胡适书信集》。
- 93, 43 卷, 616 页, “致孙毓筠”, 应该为“致赵少侯”。原因见《胡适书信集》上卷 517 页, 全集 24 卷 57 页。
- 94, 43 卷, 620 页, 第八行, 应该为 1930 年, 而非 1940 年。
- 95, 43 卷, 620 页, 后两篇, 本是同一篇, 却两次录入。
- 96, 43 卷, 622 页, 第十一行, 应该为“11 月 27 日”而非“12 月 27

日”

97, 43 卷, 634 页, 第六行, 应该为“1931 年”, 而非“1936 年”。

98, 43 卷, 647 页, 第二篇, “遗墨”前, 似乎漏“先生”二字。

99, 43 卷, 653 页, 第四行, 无“考证”二字。

(作者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 胡适 *What I Believe* 及 *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 与《四十自述》关系考辨

张 婷

[摘要]: 目前针对胡适少年时期思想的研究, 通常使用的是胡适的《四十自述》及《我的信仰》(*What I Believe*)。对于胡适的其他英文作品使用不多, 而且关于《四十自述》与 *What I Believe* 及其他相关英文文章的关系还没有人加以注意。本文通过《胡适日记》及书信的记载, 考察胡适的 *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 与 *What I Believe* 的内容与成书时间后, 认为它们就是写作《四十自述》的最初蓝本。

[关键词]: 胡适, *What I Believe*, *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

### 一、*What I Believe* 的发表

对于胡适少年时期思想发展的研究, 学术界通常使用的史料是胡适自撰的《我的信仰》(即 *What I Believe*) 及《四十自述》。一般认为“《我的信仰》是胡适的英文作品 ‘*What I Believe*’ 一文的译文。英文原刊《生命哲学》(*Living Philosophies*) 一书, 1931 年纽约 Simon 和 Schuster 出版公司出版。同年, 向真译为中文, 收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中国四大思想家的信仰之自述》(赵家璧主编:《一角丛书》第一种)。另有

《时人自述与人物评传》（出版处不详）所收的明耀五的译文。”<sup>①</sup>如今流传最广的《我的信仰》中文翻译，普遍采用的就是明耀五的译本。但实际上，这个译本是经过章衣萍修订的，“友人明耀五君现将先生所作 *What I Believe* 译成中文，该稿已由大东收买，作为《英汉对译丛刊》之一。译文由衣萍代看过一次，略改数处。”在这次翻译过程中，译者极为慎重，力求准确可靠，遇到不可解之处，还向胡适求证：“惟间有疑问之处，如文内所引大白诗及 Browning 诗等，（所引 Browning 诗，衣萍记得先生曾有骚体译文在《藏晖室札记》中。）非得先生亲笔校改不可，现由邮挂号寄上，请先生拨冗一改，无任感荷。”<sup>②</sup>胡适是否亲手校改了哪些地方，现在已不得而知。但是，这至少说明 *What I Believe* 的翻译、发表是在胡适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编著的《胡适英文文存》（共三册）中，*What I Believe* 就是根据 *Living Philosophies* 书中影印的。【改为：收入周质平教授编著的《胡适英文文存》（共三册）中的 *What I Believe* 一文，就是影印自 *Living Philosophies* 一书。】*Living Philosophies* 一书共收入了 22 篇文章，胡适的文章放在第 16 篇的位置上。编者邀集了诸如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罗素（Bertrand Russell）、杜威（John Dewey）等当时最富盛名的科学家、哲学家来撰写文章，讨论人生与哲学的问题。书中所收的文章都没有再单独列题，所以《胡适英文文存》影印收入胡文时，仅注明 *Essay in Living Philosophies*，而没有给出具体的标题，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从现在发现的资料来看，胡适的 *What I Believe* 在当时引起读者的关注，并非是在 *Living Philosophies* 出版后，而是在这篇文章先部分的转载于《Forum》杂志上时。1931 年 2 月 27 日刘大杰致胡适的信中提到，“你在《Forum》（论坛）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我的信仰》（*What I Believe*）有一个人译了一部分寄给我了，想在《现代学生》上登载。”<sup>③</sup>差不多两个月后，时在美国求学的龙冠海也写信给胡适说：“我于前两三个月在《Forum》报上看了你的《*What I Believe*》之后，对于你的思想才有一番清澈的了解（以前虽然读过你的书，但那是没有系统的），刚才读了这篇

<sup>①</sup> 《第一册说明》，胡适：《胡适文集》第 1 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3 页。其中，“Sichuster”应为“Schuster”之误，见[美]周质平编：《胡适英文文存》第一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第 381 页。《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共 44 册）的第 35-39 册为胡适的英文著述，但是由于《胡适英文文存》是影印胡适英文原件。故此处多引用《胡适英文文存》。1939 年，Simon & Schuster 又出版了 *Living Philosophies Revised*，名为 *I Believe*，但是是在胡适任驻美大使后，关于 *Responsible Thinking* 的。

<sup>②</sup> 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33 册，1931 年 6 月 16 日章衣萍致胡适信，黄山书社，1994 年，第 170-171 页。

<sup>③</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 年，第 51 页。又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 548 页，译文。

中文的，又加清澈些。”<sup>①</sup> 在《Forum》杂志的目录上是这样注明的：“*What I Believe. Living Philosophies XVI*”，XVI列出了这篇文章在*Living Philosophies*中是第16篇的位置。<sup>②</sup>这篇文章会出现在《Forum》杂志上，很可能与杂志的编辑Dr. Henry Goddard Leach有关，因为*Living Philosophies*的成书就是他直接促成的，书前的Notes中记：“The publishers wish to acknowledge their indebtedness to DR. HENRY GODDARD LEACH, Editor of The Forum Magazine, for his invaluable cooperation in the arranging and publication of their symposium.”<sup>③</sup>所以在为*Living Philosophies*组稿的同时，他也有机会将这篇文章放在《Forum》杂志上刊登。

## 二、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 的发表

从发表时间上看，胡适第二次用英文来介绍自己的思想，是*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sup>④</sup>，该文1934年2月16日发表于The People's Tribune, vol 6, no. 4（《民众论坛》，出版于上海）。这一篇与*What I Believe*在内容上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唯一的不同是，*What I Believe*在第一部分描写父亲胡传的地方多了一段——在森林中迷路，后根据生活经验，顺着水流的方向而找到出路的故事<sup>⑤</sup>。段落的最后，胡适并且说明他曾把这件事写到《实验主义》中，证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正确性。

单从两篇文章的发表时间及字数上判断，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是在*What I Believe*基础上删节而成。其实不然，事实上，*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的写作时间早在他发表的四年前，甚至远在他撰写《四十自述——在上海（一）》之前。1930年2月16日《日记》“今天开始作*My Credo*一文。”<sup>⑥</sup>这篇文章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1930年3月4日《日记》：“今日写成*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 [《我的信仰及其演变》]一文，约一万字，超过原约的字数不止一倍了。共费时约

<sup>①</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56页。

<sup>②</sup> 1930年美国Forum杂志与Century杂志合并，成为Forum and Century，但是习惯上仍称为Forum。*What I Believe*登在1931年Forum and Century的1、2月合刊上。但是只登载了一部分，到胡适《去上海》前为止。

<sup>③</sup> *Living Philosophie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31.

<sup>④</sup> [美]周质平编：《胡适英文文存》第二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579页

<sup>⑤</sup> 胡适：《我的信仰》，《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页。“有一次与我父亲同走的一队人，迷陷在一个广阔的大森林之内，……并写信问我是不是他们故世已久朋友的一个小儿子。”

<sup>⑥</sup>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75页。

二十日。此文写我的人生观的演变的历史，很有点趣味。中间为字数所限，不能不从简略。然其中有些地方应该可以使读者得点益处。”<sup>①</sup>

两篇文章前后只有加减一段与否的差别，却在相距三年时间后，分别发表在国内和国外的刊物上。之所以出现这样情况，并不是胡适删改旧作重新发表，实际上*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就是为*Living Philosophies*写的，从这一点上看，*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就是后来的*What I Believe*。1931年7月15日《日记》：“My Credo是为了*Living Philosophies*一书作的，此书本月出版，今天收到第一册，印的很好。听说销路不恶。”<sup>②</sup>这篇自记很有价值，从中至少可以知道两件事：第一，胡适打算为*Living Philosophies*撰写的文章，原题是*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但是这个题目在书中并没有显示。这就说明书中原来就有描写他的父亲根据生活的经验，而在所迷失的森林中找到出路的故事。第二，*Living Philosophies*是在1931年7月才出版的。联系*What I Believe*这个标题的第一次出现是在《Forum》杂志1、2月份合刊中，要比*Living Philosophies*早出版5个月。一个“大胆的假设”是，很可能《Forum》杂志的编辑Dr. Henry Goddard Leach将胡适的*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改成*What I Believe*，以便与全书或杂志一致。

### 三、从 *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 到《四十自述》

对于*What I Believe*这个名字的出现，胡适当然是知道的，但是在实际使用中，他仍始终以*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来称呼自己的这篇文章。在1931年3月4日《日记》中，他记到：“校印*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单行本，分送朋友。”<sup>③</sup>3月20日《日记》：“校我的Credo完，不久可付印。”<sup>④</sup>从出版时间上看，能在3月份看到出版品的只能是《Forum》杂志上的*What I Believe*，因为*Living Philosophies*是直到这年的7月份才能出版的。很偶然的是，在北大图书馆，笔者找到了一份“分送朋友”的*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一共44页，书前有胡适的亲笔题字：“送给子水 适之”<sup>⑤</sup>，子水当是毛子水。从这几个字看是典型的胡适体，“一横一捺都拖得很细很长，好像是伸胳膊伸腿的样子。”<sup>⑥</sup>更为重要的是，封面标题*My Credo and*

<sup>①</sup>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80页。其中的it's当为its之误。

<sup>②</sup>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8页。

<sup>③</sup>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0页。

<sup>④</sup>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0页。

<sup>⑤</sup> Hu Shi: *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 1931年。

<sup>⑥</sup> 梁实秋：《胡适先生二三事》，《梁实秋怀人丛录》，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

*Its Evolution*下注明，此书是翻印自《Forum》：“Reprinted from The Forum (Jan-Feb,1931)”证明了它即是*What I Believe*，内中也有父亲胡传找溪水而走出森林的事。不过，*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实际上有两个版本，在北大图书馆里还有另一份同一书名的书，封面上注明：“Reprinted from The Forum (Jan-Feb,1931) by The Peiping Chronicle by special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for private circulation” The Peiping Chronicle是当时北京的一份英文报纸，他们这一次再翻印自《Forum》也是为了供给胡适的私人用途。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次的翻印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在文中根据内容发展而增加了十二个小标题，这就已经初步具备了《四十自述》中的构想，依次是：

- “1、My Father,
- 2、My Grandfather and His Ambition,
- 3、My Mother,
- 4、Early Education and Questionings,
- 5、A Comic Interlude,
- 6、New Education in Shanghai,
- 7、Darwin and Chinese Philosophy,
- 8、Difficulty, Despondency and Deliverance,
- 9、In the United States,
- 10、Lao-tze ,The War and Pacificism,
- 11、The Problem of Immortality,
- 12、A New Decalogue.”<sup>①</sup>（案：为说明方便，序号为笔者所加）

这里面前九个标题与《四十自述》中的标题都极其相像，而且正文内容中也有一致性。具体来说，《四十自述》中的《我的母亲的订婚》即是My Father、My Grandfather and His Ambition及My Mother三篇文章的综合。《九年的家乡教育》即是Early Education and Questionings，《从拜神到无神》中把神像扔到河里的一段即是A Comic Interlude，《在上海》（一）和（二）就是New Education in Shanghai和Darwin and Chinese Philosophy，《我怎样到外国去》包括了Difficulty, Despondency and Deliverance和In the United States两个小篇章。

以上是从文章的标题及内容上比较。从时间上看，《四十自述》的动笔也紧随*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之后。前面提到过*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完成于1930年2、3月间，一年以后，1931年3月胡适将《Forum》上的文章校印，送给朋友。《四十自述》中《我的母亲的订婚》写于1930年6月26日<sup>②</sup>，《九年的家乡教育》写于1930年11月21日<sup>③</sup>，《从拜神

<sup>①</sup> Hu Shi: *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

<sup>②</sup> 1931年3月10日《新月》第3卷第1号。

<sup>③</sup> 《新月》第3卷第3号



到无神》写于1930年12月25日<sup>①</sup>，《在上海》（一）写于1931年3月18日<sup>②</sup>，《在上海》（二）没有注明时间，但是发表在《新月》第3卷第10号中，可知仍在1931年中。《我怎样到外国去》完成于1932年9月27日<sup>③</sup>，以上时间都是在*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创作之后。所以从内容、标题和写作时间三方面上，都可以看出*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就是写作《四十自述》时的蓝本，所不同的是这为英文的“初稿”。实际上，在当时，胡适周围的一些朋友就已经将*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与《四十自述》划上等号了，如1931年6月，王世杰就说：“数月前接到你的《四十自述》的英文本，我当时从头至尾看了两遍。读了颇自兴奋。”<sup>④</sup>此即是胡适“分送朋友”的*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

综上，*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原是胡适为*Living Philosophies*一书撰写的自述性文章，但是因为先期以*What I Believe*的名称刊登在《Forum》杂志中，而被沿用下来。不过，胡适在校印《Forum》后，仍使用原来的名字，并于三年后在国内的*The People's Tribune*上重新发表。另一方面，《四十自述》的撰写是在*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完成后不久开始的，故在内容安排及小标题设置上都有相当多的沿用痕迹，所以*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可能是胡适笔下最早的一版《四十自述》。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

## 胡适断案

张书克

戴震是否剽窃了全祖望、赵一清研究《水经注》的学术成果？对于这个案件，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张穆、魏源、杨守敬、王国维、孟森等学者倾向于认为，戴震剽窃的罪名成立，他的确侵犯了全祖望、赵一清的知识产权。胡适则力排众议，认为戴震是冤枉的。在我看来，有意思的不是胡适的结论，而是他在审理戴震案件时的态度。

20世纪40年代，从驻美大使职务上卸任后，因为身体原因，胡适滞留美国，并且因为和王重民通信的因缘，他重新燃起了对戴震案件的兴趣。

<sup>①</sup> 《新月》第3卷第4号

<sup>②</sup> 《新月》第3卷第7号

<sup>③</sup> 1932年11月10日《新月》第4卷第4号。

<sup>④</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1931年6月18日“王世杰致胡适信”，中华书局，1979年，第72页。

虽然是个学术问题，胡适却借鉴了诉讼法尤其是证据法的一些概念和原则。胡适刚刚接触戴震案件时，他的一个本能反应是：“此案证据不足，戴震剽窃的罪名不能成立。”胡适虽然不是学习法律专业出身，但他毕竟在美国待过很长时间，也虚心向法律界的朋友求教过英美证据法的规则（胡适 1928 年 3 月 31 日的日记中记载：谢永森等推事来访，谢永森对胡适说：英美证据法最谨慎，法官的任务止于审查当事人所呈的证据，而不得出位去自寻证据。日本的影响使中国的法官误解所谓“职权调查”，始有出位别寻证据的办法），了解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制度和证据规则，他的本能反应说明了英美国家法律精神对他的影响。因此，胡适这样说道：“英美法系的证据法，凡是原告或检察官提出来的证据，经过律师的辩论，法官的审判，证据不能成立的时候，就可以宣告被告无罪。照这个标准，我只要把原告提出来的证据驳倒，我的老乡戴震先生就可以宣告无罪了。”也就是说，如果根据英美证据法的规则，审理戴震案件将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但是，当胡适拿起笔来写中文的判决书时，却感觉很困难。这是因为，中国的法律文化迥异于英美。中国的法律传统，历来重实体轻程序，诉讼法很不发达，至于所谓的“证据规则”，更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甚至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的证据法也没有发展起来。比如胡适 1944 年 10 月 7 日的日记记载，胡适和武汉大学法学教授葛扬焕谈及证据法时说：证据法和人权保障关系极为密切，并问葛扬焕当时中国诉讼法的证据原则是什么。葛回答：是“自由心证”。这就可见中国证据法发展之一斑了。更加糟糕的是：在中国的法律传统中，也没有“无罪推定”原则的地位，被告不享有沉默权，相反，却必须承担起证明自己无罪的举证责任来，否则，大刑伺候。在中国，作为被告总是吃亏的，他的人权根本就无法得到保障。胡适这样说道：“旧日打官司，糊涂问官先拔签打被告的屁股：‘你一定不是个好东西！不然，怎么人家不告别人，单告你！’”这就近乎“有罪推定”原则了。胡适认识到：“（在中国的法律传统下）我证明原告的证据不能成立还不够，还得要做侦探，到处搜集证据”。“我还得提出证据来证明戴震先生的确没有偷人家的书，没有做贼。”这样，作为本案的法官，胡适还得“出位去自寻证据”。

他开始“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胡适晚年花了近 20 年的时间来寻找“戴震无罪”的证据，很多人认为不值。我也为胡适的做法感到很是困惑。既然他清楚认识到中外证据规则的差异，并且显然认为英美证据法比中国的法律传统优越，他为什么不采用更加先进的做法呢？既然他认为“此案证据不足，戴震剽窃的罪名不能成立”，为什么不根据英美证据法的精神，判决戴震无罪开释，而是去做无用功，费力去搜寻“戴震无罪”的证据呢？从法律的角度看，花了近 20 年的时间来寻找一个人无罪的证据当然不会有结果而且是相当荒唐的做法。正所谓：“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对于这个问题，我经过一番思考后，提供一个解释。在胡适的思想中，

大概存在这么一个前提：虽然中国法律制度存在缺陷甚至可以说有重大的弊端，但在改良以前，仍然是有效的，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有约束力的，我们仍然应当执行。这种苏格拉底式的对法律的愚忠，也许正是法治精神的真正体现？

（作者现供职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司法局）

## 胡适日记中的“米桑”是谁？

张书克

胡适 1949 年 2 月 25 日的日记中这样说道：“下午，米桑来，11 年半没相见了！”

“米桑”显然是人名，但对大家来说却极为陌生；作为人名，它在胡适日记中似乎也只出现了这一次。我不禁有点好奇：“米桑”究竟是谁？

答案其实不难索解。“米桑”就是曹诚英。

根据胡适日记的记载，1923 年 9 月 21 日，胡、曹二人在杭州度假时，曾经同看大仲马的《续侠隐记》第二十二回“阿托士夜遇丽人”一段故事。胡适认为这个故事可演为一首记事诗。曹诚英催促他把这诗写成。胡适感觉从散文译成诗，是一种有用的练习，遂写成《米桑》一篇，“凡九节，每节四行，有韵”。（此诗已佚）

很多写胡、曹恋情的文章都提到：1949 年 2 月，胡适经上海准备离开大陆时，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请胡适吃徽州饼，并请来在复旦大学任教的曹诚英作陪。当时曹诚英劝胡适留在大陆，胡适只是微微一笑，并没有听从她的劝告。证之胡适的日记，上述说法似乎并不正确。胡适的日记证明：1949 年 2 月，两人的确见过一面，但那是在胡适的住处，似乎并没有其他人在场。

有意思的是胡适并不直接在日记中写下曹诚英、或者曹佩声或者娟，而是以“米桑”来作为曹诚英的代名这一点。这一方面表明，胡适难忘他那段“烟霞岁月”、“神仙生活”，另一方面，大概也是想为自己保存一点隐私、为后人留下一点考证工作吧。胡适的确是“一个极其谨守个人隐私的人”（江勇振语）。

## 胡适的佚文和佚信

### 1、我对于北京第一个试验学校的希望

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前几天仁山先生同我说办试验学校的事情，我当时就很赞成。今天叫我来说话，我很惭愧没有学过教育，亦没有办过学校的经验。我是一个研究哲学的人，与实验哲学有关系的事业，当然有认为本家的必要，所以對於创办试验学校，是很赞成的。方才仁山先生已把办学的几个意旨说出来，我以为少嫌抽象一点，但在办事以前能提出几个重要的纲领亦是可以的。我是一个研究哲学的人，但不愿说抽象的东西。所以我以为实验是好的。但实验并不是无范围无目的地随意进行，拿教来作例，并不是今天听说蒙台梭利（Montessori）教育好，就试验蒙台梭利，明天听说道尔顿制（Dalton Plan）好，就实行道尔顿制。所以实验并不像阿米巴到什么地方就算什么地方一种无方向无目的的进行。我们讲到试验，并不是瞎试验，应当先有一个一定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定下之后，既不是一成就不变的，又不是时时可以随便变的，实在应当从试验的结果，时时求适应。总之如果我们要试验，至少须有个假设，至少须有个最低限度。

我们讲到初中的国文，外国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等等，到毕业时，各项功课应当学到什么程度，教师供给学生材料，又应当到什么地位？必须先有了最低的限度，进行时才能有一定的范围。如初中的国文，如何能使一个国民站起来说话，坐下作文章及读书，能有乐趣而不感痛苦，能流畅顺适，而不迟滞死板？在说作读三方面，至少亦须使他们能清清楚楚表现自己的意思与观念。至于讲到最低限度，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国文能讲到什么程度，应选择什么材料，有人主张文言白话同时加入的，有单独先注重白话而后再注重文言的。前年我在上海定课程标准的时候，對於白话文言的材料，都有一个最低限度主张。有了最低限度，才有伸缩的范围。近来我见天津某校教诗，逐字逐句，讲的呆板极了，并且还在每句压韵的地方，注以一东二冬三江四支等字样。大家想想，按照这种办法去教国文，初中三年的工夫，学生能学得了多少！又如有人告我某大学讲《庄子·天下篇》，逐字逐句，每一段讲得精致细腻极了，但讲了许多时候，还没有讲完。所以有人说笑话，用‘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天三夜，还

在黄牛’的笔法说，‘今年天下篇，明年天下篇，讲了三年，还是天下篇！’这样的办法讲是讲的好极了，但是学生自动的读书能力，完全抹杀了。

再看现在中学校的英文程度，坏得不得了，回想我们从华英初阶读起，用了三四年的工夫，居然可以把英文读通，现在用了五六年的工夫，中学英文程度坏到这样地步，真是莫名其妙！我想此中最大毛病在没有养成儿童自动读书的能力。我信今后如果打破呆板讲解的办法，我们定下最低限度，定下选择材料的范围及方法，多多选择材料，交学生自动的去读，我信将来的效率，要比现在呆板讲解底下的效率要增多一百几十倍！

我今天仅拿国文英文做例子来讲讲，其余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等，亦应当有自动办法，以谋增加效率。我现在总起来说，试验不是无目的而随波逐流的，必须要有假设试验；试验进行的时候，不是无计划的冲动，撞东撞西的，必须有一定的范围，至少亦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

此篇演说词收在艺文中学 1926 年 2 月 1 日印行的《艺文中学校筹办缘起·发起人大会纪要》一书中。艺文中学由高仁山、胡适、陈大齐、陈翰笙、汪懋祖等 34 人发起，于 1925 年 5 月 31 日举行了发起人大会。胡适当选为该校董事，高仁山则当选为校长。在筹备发起人大会上，高仁山要求胡适以《我对于北京第一个试验学校的希望》为题发表演讲，上文就是胡适当天演讲的内容。《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31 册有高仁山 1925 年 6 月 23 日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信中说

“适之先生：

艺文中学发起人会纪事录二份寄呈。内有先生演说稿，系仁近日追忆，略事写出。其中不无遗漏，舛误之处，祈即斧正寄回！”。

《艺文中学校筹办缘起·发起人大会纪要》系 1926 年印行，内中胡适的演说内容，应该就是在高仁山 1925 年 6 月追忆稿基础上，经胡适修正而采用的。

（此文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在站博士后何树远提供，演讲后面的按语，亦系何先生所加）

## 2、七学术团体对美国退还赔款用途之主张

敬启者，同人等所代表之下列各学术团体，为美国退还赔款事，曾于本月九日及十日，为两度之集会，议决意见三项，敬缮一份，分陈外交部，教育部，及美国公使，用备采纳施行。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今已由美国国会议决其用途，惟希望以教育及其他文化事业为限，并无其他条件。美国国民及政府之善意，诚深可感佩。惟同人等详加考虑，均谓欲使退还赔款，实有裨益中国文化之发展，则下列原则，实最必要，且最易实行

(一) 各种教育及其他文化事业中，中国现在所最需提倡而有补助之必要者，尤为专门科学之研究。盖学术研究，为文化本源，而专门学生毕业后，亦必须有高深研究之机关，庶能有所造就，有所贡献，故退还赔款中，应酌提相当成数，专以发展科学研究。

(二) 退还赔款，应作为固定基金，以维久远。基金之保管，及其利息用途之具体支配，则由基金委员会负其全责。盖详细支配，费经慎重审议，难臻至当，不如将委员会先行成立，俾得负责有人也

(三) 基金委员会之组织，闻美国方面已承认以中国委员居大多数，关于委员之资格，得有经验声望素著之人参与其间，诚属有益。惟依上列原则，委员责任，不但保管基金，亦且审议用途，故中国委员中应有相当额数，以熟悉中国教育及学术事业，并有相当成绩之教育家或学者充任。

中国科学社胡适、中国天文学会高鲁、远东生物学会李煜瀛、考古会沈兼士、中国地学会陈垣、中国地质学会翁文灏、中国气象学会蒋丙然

按：此函录自 1924 年 6 月 13 日北京《晨报》第六版，是上述七团体致外交部、教育部及美国驻华使馆的一份公函。

1924 年 5 月 21 日，美国国会决议将美庚款余额退还中国，用于教育文化事业。消息传来，国内各社团皆思分羹。中国科学社主张把美国的赔款，拿一部分来办科学事业。为此中国科学社一方面由其美洲分社就近与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交涉，希望中国科学社得领此次退回赔款六分之一，以作提倡科学于中国之经费；另一方面在国内推举胡适利用其与美国驻华公使休满之师生关系，争取庚款。胡适对此事态度颇为积极，致函杨杏佛等建议由中国科学社干部在京沪等地分头鼓吹，并与其他科学社团联合，一致进行。胡适以个人名义于 5 月底 6 月初致函外交总长顾维钧。据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所录顾维钧 6 月 23 日回复胡适的函件，内称“本月二日接奉惠函，承示美国此次退还赔款，我国应先定一原则，即以此款全数作为基金。十一日又接公函，代表各学术团体议决意见三项，谋虑深长，胥中窾要，曷胜钦佩”。顾维钧 11 日所接之公函即上录七团体之公函。函中所提三原则与中国科学社及胡适本人对美国庚款的希望相符合。此函由胡适代表中国科学社领衔发出，或是因其在国内外知名度远胜于其他团体及代表。

（何树远先生整理提供，并加按语）

## 2009 年 1 月至 6 月胡适研究文章目录索引

### 宋广波辑录

- 胡适“哪里去” 一东 人才资源开发 2009-01-10
- 民国时期关于胡适的假新闻——兼谈鲁迅一篇杂文的失实 陈漱渝 同舟共进 2009-04-01
- 胡适的集句联 程巢父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9-03-30
- 被抛弃的“过河卒子”——胡适在美国的外交生涯 陈漱渝 百年潮 2009-02-04
- 张元济致胡适一通书信的系年问题 吴元康 出版史料 2009-03-25
- 为什么说“整理国故”是一场运动 卢毅 东方论坛 2009-04-15
- 王的诤臣——胡适论知识分子的角色及使命 陈占彪 安徽史学 2009-01-15
- 胡适与蒋介石谋面之前的一场迂回战——上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中国的人权运动 陈漱渝 鲁迅研究月刊 2009-06-15
- “不自觉”的暗合——析传统文化对胡适科学理性的建构的影响 张超 山东社会科学 2009-02-05
- 自由主义与禅——以胡适的禅宗思想史研究为例 程茵；李笔浪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01-05
- 胡适在“救亡”运动中 郑万鹏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9-03-28
- 文坛两巨星盛赞武汉大学——郭沫若与胡适比较研究札记之一 易竹贤 郭沫若学刊 2009-03-15

鲁迅与胡适:两面旗帜的“陌路”与“同途” 乐朋 同舟共进 2009-05-01

胡适科学理性指导下的文学主张 张超 齐鲁学刊 2009-03-15

世界语境下文化的选择与分野——论胡适与梅光迪之分合 方习文 巢湖学院学报 2009-03-25

胡适与美国教友会“很多年的友谊” 张唐彪 黑龙江史志 2009-01-23

胡适体育思想探颐 李静波;田春阳 体育科学研究 2009-01-28

从整理国故到再造文明——浅析胡适的社会改革思想 张腾 黑龙江史志 2009-04-2 胡适的教育独立思想论析 韩清林;李运昌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9-05-25

实用主义哲学的转变——从杜威到胡适 周良发;李友 沧桑 2009-02-28

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经过 林齐模;顾建娣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1-25

胡适妙解白话电报 寇才 人才资源开发 2009-06-10

胡适的拒信 颠峰 思维与智慧 2009-01-20

简评胡适的文化现代化思想——胡适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 郭静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4-15

胡适与中国现代学术建设 苏桂宁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03-15

评胡适、鲁迅、郑振铎的《西游记》研究 吴圣燮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9-06-30 浅析胡适实用主义伦理思想的核心 商增涛;赵华 金卡工程(经济与法) 2009-01-20

雨中的普林斯顿 姜异新 书屋 2009-02-06

胡适对毛泽东《蝶恋花》词的“批评” 邵建新 党史博采(纪实) 2009-03-05

四合,四不合——揭秘自由主义和胡适的中国宿命 朱智勇 科教文汇(上旬刊) 2009-02-10 胡适与黄侃“斗法” 刘继兴 文史博览 2009-03-05

“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行宪国大”上的胡适 陈漱渝 百年潮 2009-04-04

思想先行者——胡适 刘亚文 大众文艺(理论) 2009-06-15

胡适接受美国诗歌影响的基础工程 陆耀东 外国文学研究 2009-02-25

论惠特曼自由诗对胡适白话诗的影响 王光和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科



版) 2009-01-10 论胡适对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接受 王光 and 江淮论坛 2009-02-15

与历史博弈:“扩大会议”时期的胡适 干有成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4-15

浅析胡适职业教育思想及其对现代职业教育的指导意义 苏丹 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4-15

胡适翻译思想探析 李红绿; 赵娟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09-05-15

“问题与主义”之争九十年回顾与思考 袁刚; 陈雪嵩; 杨先哲 学术探索 2009-06-15

胡适出使美国始末 陈漱渝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5-10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与胡适的国学思想 陈卫星 时代文学(下半月) 2009-03-15

胡适之进北大 VS 达尔玛打“内战” 班允刚 市场观察 2009-06-05

胡适与第八届教育会联合会 李兴韵 历史教学(高校版) 2009-05-16

胡适关于中学国文教育的三次讲演——侧重第三次讲演 梁心 社会科学研究 2009-01-01

胡适治学方法及其与朱熹、戴震学说的渊源 芮常木; 肖泉 黄山学院学报 2009-02-20

论西方文化对三十年代初胡适人权思想的影响 袁强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02-15

胡适首次赴美的时间问题 古胜红 民国档案 2009-02-25

一本书的书名和广告 房向东 编辑之友 2009-03-20

胡适的改良主义暨上世纪 50 年代的“批胡运动” 曲洛松 福建党史月刊 2009-01-23

纪实传真 重史轻文——论胡适的传记文学观 王嵩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02-15

纪实传真,重史轻文——论胡适的传记文学观 王嵩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04-15

胡适对《镜花缘》的“女权”解读 杨建民 博览群书 2009-03-01

诗学操控下胡适诗歌翻译特征 李磊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6-15

论译者主体性在胡适白话译诗中的体现 盛萍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05-25

“亚东本”小说序跋与古典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范式的建立——以胡适为中心

孙逊; 赵真 天津社会科学 2009-01-23

胡适与实验主义——兼论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饶娣清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03-15

胡适的“五四”文学革命发生论 邹巛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2009-01-15

胡适的面子 李新刚 文史月刊 2009-02-01

梁启超、胡适打哲学对台 张培忠 全国新书目 2009-03-01

宋美龄访美与胡适大使去职隐情 张令澳 世纪 2009-01-10

“不爱”中的真爱——俞平伯《愿你》与胡适《“应该”》对读 殷鉴 名  
作欣赏 2009-05-01

此情就关风与月——从诗学的角度解读胡适留美期间的中诗英译活动  
魏淑仙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09-06-25

胡适的治学范式与中国近代学术转型 王少卿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09-03-25

新文化运动与立国进程之转向——以胡适中心 姚中秋 中国政法大学  
学报 2009-05-10

民国学者胡适等对中学文言文教学的理论探索及其启示 郑力乔 琼州  
学院学报 2009-06-28

《水经注》案与现代思想史上两条道路的争论——胡适重订《水经注》案  
的学术动机再探 严燕子 湘潮(下半月)(理论) 2009-03-25

从胡适、梁启超的书目谈起 巫少飞 书屋 2009-05-06

略谈胡适的小说考证与整理国故 谢桃坊 古典文学知识 2009-05-05

胡适的婚外情 陈延吼 文史天地 2009-03-08

胡适两封电报时间考辨——兼及 1920 年安徽迎拒教育厅长风潮 周宁  
安徽史学 2009-03-15

胡适在美国的 26 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周质平访谈录 姜异新 粤海  
风 2009-01-15 萧瑟秋风里 文人也谈兵——从有关胡适的两则史料  
解读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 戚厚杰 百年潮 2009-05-04

胡适先生的交际魅力 姚宏越 传承 2009-02-10

溥仪与胡适的一次宫中密谈 马克锋 人民论坛 2009-01-23

且说林损怨怼胡适这桩陈年公案 李振声 书城 2009-03-05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严文郁写给胡适的两封信——史料、纪念与感想  
邹新明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9-03-21

名人手迹 胡适 档案春秋 2009-04-10

胡适不作广告 王树人 文史月刊 2009-03-01

高宗武和胡适交往档案 胡长明 粤海风 2009-03-15

新教育与新文学的相互推进——以胡适在北大的教育改革和文学革命实践为例 覃文珍 大学教育科学 2009-06-28

胡适青岛网罗人才 秦晚 人才资源开发 2009-04-10

胡适:宁鸣而生,不默而死 张军 全国新书目 2009-03-01

孤独者胡适 王郢娜 资治文摘(管理版) 2009-02-20

省界 业界 政治——20世纪20年代胡适与安徽省教育厅长的选定 徐希军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05-10

坚持科学理性“为大中华,造新文学(化)”——解读胡适科学的人生观 朱德发 东岳论丛 2009-01-25

胡适版的“欧洲各国国语史”:作为旁证的伪证 程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06-30

中国知识界对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不同反应——以胡适、罗隆基和胡愈之为例的考察 郑大华;刘妍 抗日战争研究 2009-02-26

戴震与方志及其手稿与胡适跋文 沈乃文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05-15

胡适认知老子“道”的三种路径 李承贵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5-15

新文化运动的“文白之争” 刘继兴 传承 2009-05-10

沈尹默与胡适的相互攻讦 张耀杰 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 2009-05-10

关于“问题与主义”讨论的再讨论——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张劲;吴思思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6-15

中国近代的宪政之争——也谈严复和胡适的宪政观 苑容宏 博览群书 2009-02-01

鲁迅、胡适如何面对“诺贝尔奖”提名 杨建民 决策与信息 2009-05-01

鲁迅和胡适教育观之比较 李永青 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5-20

析五四先驱们“西化”观——以陈独秀、胡适为例 曾永恒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6-20

解放战争时期胡适的政治思想与政治主张 曹建坤 安徽史学 2009-01-15

图文传与传记文学的普及大众化趋向——从《胡适传》第四版所想到的 易竹贤 东方论坛 2009-02-15

## 《胡适研究论丛》第二辑征稿启事

- 一、《胡适研究论丛》由胡适研究会主办，不定期，以书代刊。登载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包括：胡适研究的论文和文章，胡适的佚文、佚信、相关的照片及其他文献资料；与胡适紧密相关的近代思想史诸问题的研究，与胡适交往较多又在民国思想、学术史上影响重大的人物的研究论文和文章等等。
- 二、《胡适研究论丛》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选取稿件惟重学术建树。
- 三、来稿字数不限；提倡言简意赅，详略得当。
- 四、来稿务请遵循学术规范，遵守国家有关著作权、文字、标点符号和数字使用的法律和技术规范以及本刊有关规定。引文应准确无误，注释置于页末，相关信息务求准确、完备。
- 五、注释一律采用页末注，而不用文末注。每一条注都要有独立的注文，不得将散在各处、出处相同的注合并标注，亦不用“同上”、“同某注”等注法。征引图书的基本项目及顺序通常为：□责任者姓名与责任性质；□书名；□卷册数；□出版者及出版时间；□页码。第二次后征引同一著作时，省去出版者及出版时间，翻译图书同时省去作者国别和译者。
- 六、来稿一经采用，即行通知。文章发表后，即付稿酬。
- 七、来稿截止日期为 2010 年 9 月 30 日。
- 八、投稿人请提供电子文本。电子邮件地址：[hushi911217@126.com](mailto:hushi911217@126.com)
- 九、收稿人联系方式：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近代史研究所宋广波，100006

## 《胡适研究通讯》征稿启事

为了推动胡适研究，保持和加强胡适研究会会员和关心胡适研究活动的朋友之间的联系，胡适研究会将于 2008 年开始，刊印《胡适研究通讯》。

《胡适研究通讯》的内容主要是：汇录海内外胡适研究的各种信息；刊登胡适研究短论、书评；刊登胡适的未刊文献；登载重要著作、文章的内容摘要；报道胡适研究会的工作等等。热诚欢迎胡适研究会会员和海内外热心胡学的朋友们踊跃赐稿。

《胡适研究通讯》每年编印四期，每期 3—5 万字，将于每季度的第二个月（即每年的 2、5、8、11 月）印行。

《胡适研究通讯》为仅供学会会员阅看的非卖品，系内部印刷物，不公开出版、发行。每期印制 200 份左右。

因我们财力有限，因而凡被《胡适研究通讯》采用的稿件，一律不付稿酬。但作者可将其文稿再投给其他报刊。

《胡适研究通讯》由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先生负完全责任，由宋广波负责征稿、编辑、印制及邮寄等事宜。

《胡适研究通讯》是专门为有兴趣做胡适研究的朋友们创办的一个学术园地。我们相信这是大家所共同期盼的，能够得到大家的爱护和支持。

联系人宋广波通讯方式：

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宋广波收（邮编 100006）；

电子信箱：hushi911217@126.com

胡适研究会 2007，11，24

本《通讯》承蒙中研院近史所胡适纪念馆以及陈宏正先生予以资助，在此一并致谢。